



美国研究

标题: 作者:

关键词:

中国学生留美一百五十年

作 者:	朱祖凯	封面:	
关键字:	书评·文评		
年 号:	2002		
期 号:	第3期		
PDF文件:			
出版社:			
英文标题:	The 150 Years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中文标题:	中国学生留美一百五十年		

《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

中国学生留美一百五十年

【注释：本文为钱宁著《留学美国》英译本译者前言。本刊发表时，已经编辑修改。】

朱祖凯

1979年1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30年后，美国和中国建立了邦交。在双方互换大使的五天前，50名中国学生到达美国，去各大学进修。到1995年，中国留学生总数已超过22万，大多数是去美国的。1999年，约4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大专院校上学。中国学生往往在其所在学校的国际学生中占很大比例。【注释：Foreword by Richard Leone in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例如，在1998-1999学年中，几个美国大学国际学生所占比例最高者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10.8%）及韩国（9.4%）；威斯康星大学-韩国（13.7%）及中国（11.9%）；普林斯顿大学-中国（15.9%）和加拿大（9.6%）。此外，90%以上的中国学生是研究生，而其他国家的学生则均匀分布于本科及研究生院。】如此多的中国学生在美学习，其所学的专业，以及他们在美国社会所受到的熏陶，将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对美国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留学美国》【注释：Qian Ning, *Chinese Encounter America*, translated by T. K. Chu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一书的作者钱宁曾

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进《人民日报》当记者，1989年9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进修新闻学研究项目（Journalism Fellowship Program, University of Michigan），第二年开

始在密歇根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在美教书之余，五年间，他访问了在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1995年5月钱宁回国后，写就了这本关于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生活经历的书。

这本书叙述了中国学生来到美国这个陌生的文化环境后所发生的变化。作者的访问虽然是片断的，但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学生在美国求生存时所遭遇到的酸甜苦辣，也使人联想到百年来中国留美学生走过的坎坷历程。

早期留美学生：1872年的第一批

1872年（同治十一年），也就是清廷派遣的第一批30名幼童去美国读书的那一年，中国已经被西方的工业革命甩在后面一个世纪以上了。中国的人口在增加，人民却越来越穷。

【注释：在17世纪前，中国的人口虽然在逐渐增加，但人口总数大致保持1亿以下。但是到1847年，中国人口增加到4.26亿，人均耕地面积从1.3英亩降到0.45英亩。1220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0%，但在1880年时，已降到6.9%。见Kang Chao,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89,

60; 近期的一份文献表明，因人口增加而导致的对土地的加速压力可能始于明朝初期。自1500年到1800年，中国人均寿命自约62岁降到约48岁。Martin Heijdra, "The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China During the Ming," D. Twitchett and F. W.

Mote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Vol. 8, pp. 450, 437. 造成西方工业革命两个因素 -- 生产潜能因知识积累的改变而改变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实现此潜能的经济及政治组织和机构的改变，在清代的中国社会都不存在。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p. 17.】推动清廷派遣留学生求知的原因是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后来与英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吃了败仗。在容闳和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 两个人的推动下，中国学生被送到了美国。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容闳18岁时进入美国蒙森学校 (Monson Academy) 就读，1850年入耶鲁大学，1854年（咸丰四年）毕业后返国。在耶鲁的时候，他感到，要复兴中国，中国的青年必须接受他所受到的西方教育。回国之后，他一再游说他这个想法。在容闳看来，虚、骄的自视、对外的无知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痼疾。【注释：容闳及1872-1881年间去美国读书的留学生的情形在钱宁的《留学美国》的第一章及第八章提到。细节可参考容闳的《西学东渐记》，《走向世界丛书》，

岳麓书社，1985年版，及Thomas E. 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42)。最近一本有关这一题材的书是石霓的《观念与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容闳的自传有新的中文译本：《我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追忆》，王蓁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义和团运动的第二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及两湖总督张之洞上书光绪皇帝说：“甚至上年夏间，京外大僚犹有谓洋人不能陆行者，有谓使馆、教堂既毁，洋人即从此绝迹者。”《光绪政要》，台湾永和镇*文海出版社，1961年版，第27卷（1901），第41页。】

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任期1861-1867年〔咸丰十一至同治六年〕，由林肯总统委任）为中国学生打开了美国学校的大门。在中国败给英法联军后短短的一个时期，曾有一些中外人士探讨过中国对外开放和建立较为平等的中西关系的可能。【注释：探求较为平等的中西关系的人计有：蒲安臣、徐继畲、文祥、英国领事，以及后来在中国海关做事的罗伯特*赫德 (Robert Hart)、英国驻清公使拉瑟福德*阿尔科克 (Rutherford Alcock)。徐继畲在任福建总督时，目睹英国舰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轻易得胜，开始研读西方地理、历史及文化，进而成为美国和华盛顿的热衷的崇拜者。蒲安臣在卸任之前赠送徐继畲一幅吉尔伯特*斯图尔特 (Gilbert Stuart) 画的华盛顿的油画。Arthur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7), p. 209; Fred Drake, China Characters

the Wor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88, 243.

徐继畲在纪念华盛顿的石碑上题写：“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畲所著瀛寰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强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驳驳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回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象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鄞县教信辈立石咸丰三年六月七日合众国传教士识”。刻该赞词的福建花冈石被存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的三百英尺高度的水平（上刻词是马里兰大学许翼云教授自石碑上直接抄录下）。

然而，较为平等的中英关系并未能实现。苏伊士运河的完工再一次引燃起英国商界对华贸易谋利的欲望，因此重新协商以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天津条约》被英国下院拒绝。见 Jonathan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0),

p. 20. 该书是本文的基本参考书。】蒲安臣卸职之后，任中国的巡回大使，游说于西方各国（及俄国）间。在他的努力下，中美签定《蒲安臣条约》(Seward Burlingame Treaty, 或 Burlingame Treaty)，其第七款宣称“中国公民将如最惠国公民同样地享有进修于美国政府管理下的教育机构的权利，”及中国给予美国公民以对等权利。【注释：Paul H. Clyd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Diplomatic and Public Documents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40), p. 85.】1871年（同治十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上书皇帝说：

“查新立美国和约第七条内载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臣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注释：《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台北*国风出版社，1963年版，第1896-1897页。李鸿章在同奏章中提到英国公使在得悉中国将派遣学生去美国读书后，表达英国欢迎中国学生去英国读书。】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留学生运动开始了。容闳被任命为肄业局副局长，设局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Hartford)市。【注释：肄业局的地址是科林斯街352号(352 Collins Street)。中国留学生先在康涅狄格州的康河河谷区(Connecticut River Valley)的中学修读，然后再进大学。康州历史学会档存很多有关中国留学生回国后的剪报。1996年，为纪念容闳、120位留学生及接待中国留学生的美国家庭，“中国留美学生纪念学会”(Chinese Students Memorial Society, www.120ChineseStudents.org) 在康涅狄格州成立。1998年康州州长约翰*罗兰(John Rowland)宣布将1998年9月22日定为该州容闳及中国肄业局纪念日(Yung Wing an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Day)。2000年5月5日，耶鲁大学在该校的访客接待中心大厅里悬挂容闳油画像。同年9月29日，“容闳国际学生纪念基金”(Yung Wing Memorial Fund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Yale)在耶鲁大学成立。容闳葬于哈特福德市锡达山墓地(Cedar Hill Cemetery)的第12区。】所选留学生的平均年龄为12岁半。

美国热情地接待了这些年幼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的十年，美国的举国政治力求缓解南北矛盾和接纳移民。肄业局得到了教会人士、政界、知识界，以及政策执行者的推动和支持。当康涅狄格州教育局局长诺思罗普(Birdsey Northrop)在民间征求接待第一批30名中国留学生的家庭时（每一家接待两、三个孩子），康涅狄格、马萨诸塞州的122个家庭应征，其中包括社团领导人的家庭。1876年格兰特总统在费城美国建国百年的大庆里举办了一个中国学生招待会，接见全部中国留学生，并与每位握手。【注释：1868年，共和党候选人尤利塞斯*格兰特当选为美国第18任总统。1870年，美国国会批准第15条宪法修正案，使全民，不论种族，皆有同等的投票权。1872年，国会通过“大赦法”，恢复了

南方人民的公民权。1875年，国会通过“民权法案”，非裔美国人享有同等的陪审权及公共设备的使用权。哈特福德市洛德山（Lord Hill，或 Lord s Hill）中的努克农场住宅区（Nook Farm），也就是肄业局总部的所在地，群聚着一些开明和有政治影响的思想家，其中包括1851年写《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女作家斯托夫人、在1876年开始写《哈克贝利芬》的马克*吐温，以及其他一些出版商、美国奴隶制度的反对者、教育家、南北战争的将军、州长及参议员约瑟夫*霍利（Joseph Hawley）。 Anita Marchant, "Yung Wing an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t Hartford,"M.A. thesis, Trinity College, 1999.】但是，这原定为20年的教育计划，只进行了9年就夭折了。

自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起，政治气氛开始改变。在中国方面，新的肄业局局长吴嘉善和前任局长陈兰彬，这两位翰林院士，认为年幼的中国留美学生已抛弃了中国的传统，染上了外国的（坏的）习俗，上书李鸿章建议解散肄业局。容闳一方面为留学生辩护，一方面替几个学生申请进入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Annapolis Naval Academy）。他的想法是学生学军事可满足清廷的迫切的需要，朝廷就会因此而继续支持肄业局。1880年（光绪六年）12月，前总统格兰特应马克*吐温及约瑟夫*特威切尔（the Reverend Joseph Twicell）牧师的请求，写信给李鸿章，忠告保留肄业局。【注释：Thomas E. LaFargue, China s First

Hundred :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50.】

同时，肄业局在美国也失了天时。1876年，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格兰特总统便成了跛脚鸭。西部各州，因横贯大陆铁路修完后劳动市场紧缩，排华事件屡屡发生。【注释：1880年，加州工人党（the Workingmen s Party of

California）的排华口号是“驱逐华人！”排华的政治气氛导致了1882年的“排华法”（曾有中国留学生在所在的康涅狄格州及马萨诸塞州对“排华法案”投了反对票）。1884年“劳工”的定义被扩大，使更多工作种类的华工被包括在排华法内。1943年，美国国会废止“排华法”。】内战后的容忍外国人和少数族裔的政治气氛逐渐地被冲毁了，肄业局的学生入军校的申请也在排华的风暴中受拒。【注释：美国国务院对容闳为中国留美学生申请入军校的回复是：“我们没有收中国学生的余地”。见容闳：《西学东渐记》（英文版），第207-209页。拒纳中国学生入军校事至今尚未得到佐证。】李鸿章认为美国拒收中国学生入军校是违反《蒲安臣条约》的。他因此下令撤消肄业局，召回学生。

支持肄业局的美国教育界抗议总理衙门撤消肄业局。由耶鲁大学校长诺厄*波特（Noah Porter）发起的抗议信里也同时显出了教育家心中的忧虑、爱护和希望：

“我们为这些青年的被召回国和肄业局的解散深感遗憾。……他们在美国的学业，受了耐心的灌溉和耕耘，已经慢慢地扎了根，长出枝干。辍了学，这些树木就开不了花，结不了果。我们教给他们的知识和文化与给我们自己的孩子和公民的是一样的。……这些年青人已经在我们的心目中培植了我们对他们的敬佩和爱护。因为辍学带给他们不可弥补的伤害和损失，我们恳求您重新考虑这突然决定的原因。”【注释：容闳：《西学东渐记》（英文版），第211-215页。】

在召回时，只有詹天佑、欧阳赓两个人毕业于耶鲁大学。辍学者在耶鲁有20人、哥伦比亚大学4人、麻省理工学院7人、伦塞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5人。约60人仍在中学。【注释：Chris Robyn, "Our Celestial Neighbors: The Chinese Mission in New England, 1872-1881," unpublished manuscript excerpted in idem, Building the Bridge: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Master of Phil. Dis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6)；高宗鲁：《中国留美幼童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传记文学》，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卷，第29页。】直到28年后的1909年（宣统元年），清廷才再度派遣留美学生。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战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

最初中国被英、法及其联军击败后，中国对日本还保持藐视的陈念。【注释：明代称在14到16世纪期间在中国沿海骚扰的日本海盗为“倭寇”。1894年（光绪二十年），清朝对日宣战书中称日本人为“倭人”。】甲午之战的惨败使全国上下意识到跟外国，不论东西，都有求知的必要。由于移民法的限制和费用昂贵，留学美国的人数较少。【注释：1906年，美国劳工及商务部长维克多·梅特卡夫(Victor Metcalf)为中国的抵制美货、排华法、及其他的美国排华立法在国会作证时说，在1903-1906年间，美国容许116名中国学生入境，12名被拒。Paul H. Clyd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p. 239.】但是去日本就容易多了。日本的书写文字以中文为基础，因此比英语容易学；日本离中国近，又急切地要招收中国学生。【注释：1898年4月或5月，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Yano Fumi)致函总理衙门说：“本国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借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本国自应支其经费。”他后来口头上提议200名中国学生接受经费支持。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一卷，第219页。同年5月4日，矢野致函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Nishi Tokujiro)说：“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参见河村一夫：《驻清时代的矢野龙溪氏》，转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第8页。】1906年在日本的中国学生达1.2万人。【注释：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63页；《学部奏咨辑要》，第1卷；一份日文文献认为中国学生人数为8千。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16页，转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24页。有关庚款退还的较详的细节及相关的中、美史料可参阅Michael Hunt, "The American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1, 1972, pp. 539-559.】

庚子还款的第二批

中国能再送学生去美国读书，或者说中国被迫再送学生去美国读书，是因为美国在1908年同意退还给中国部分庚子赔款。【注释：有关庚款退还的较详的细节可参考：Michael Hunt, "The American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1, 1972, pp. 539-559.】

列强在北京开会决定条约内容之前，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给美国代表团两个有关索取赔款额的指示：提报美国损失索取额2500万元；与列强协议总索取额不超过1.5亿元。海约翰虚报美国的损失两倍。他的策略是用削减美国索取额为由，进而在会议上要求其他列强也削减他们的索取额，并向中国要求贸易上的权利。但最终，美国与其他列强削减索取额的协商失败了。在退款之前有两件与退款有关的中美外交事件：1899到1901年间美国发轫的“门户开放”政策，和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中国抵制美货运动。外交官兼汉学家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是“门户开放”政策倡导者和美国抵制美货对策的决策者。他早年在法国学中文，就职于美驻北京和朝鲜的领事馆。后辞职，去西藏和蒙古旅行。1893年，他又回外交界服务。1900年，他发表了题目为《中国的人口研究》的文章。文章中，他非常乐观地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可以养现在人口（4亿多人）的两倍，而且生活方式也不需要革命性的改变。”列强在北京开会讨论赔款时，他是美国代表团的特别助理。他也是对海约翰所提出对中国索取额的最初的质疑者之一。

19世纪90年代，欧洲列强和日本已各自在中国划下他们的“势力范围。”【注释：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在1900年给“势力范围”的定义是对“中国某一块领土的一个标记，以表明如中国被分解，英国不愿任何别的国家得有这一块土地。”Whitney Griswold, *The Far Eastern Polic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8),

p. 52.】1899年，也就是义和团运动的前一年，海约翰在柔克义的耸恿下，要求各列强在

其势力范围内的中国港口由中国政府对列强各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注释：柔克义又先是受曾在中国海关做事的英国人贺壁理 (Alfred Hippisley) 怂恿的。Paul H. Clyd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pp. 201-217. 海约翰的外交备忘录计送给英、俄、德、法、意、日。门户开放的观念其实最初是英国在1898年对美国提出的一个试探性想法，目的是用来维护英国对华贸易的支配性地位。随后英国认为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是无法打破的，便悄悄地放弃了这一想法。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21-37.】义和团运动开始后，海约翰估计中国不久会被列强分割，因而把中国领土的完整也包括在“门户开放”政策内。【注释：Paul H. Clyd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p. 215. 从史料上看，柔克义和贺壁理一直就有维持中国领土完整的想法。柔克义在1898年给贺壁理的信中说：“我愿见到（美国）宣称维持（中国）帝国的完整。”Whitney Griswold, *The Far Eastern Policy*, p. 67. 后来的一封信里说，

“我认为我们最好暂时不要提起中国领土完整的事”。Ibid, p. 75.】但是，列强含糊的反应使美国后来不得不放弃这个政策。【注释：美国史学家倾向于认为“门户开放”是一个失败的政策，因为该政策事先未经过仔细的考虑，定义不清，未得到列强的支持，海约翰也没有支持政策后的具体行动。中国史学家对这一政策评价较为正面。李云汉说：“这……有名的门户开放政策，得以暂时协调了各国的步骤，使中国免于被瓜分的悲剧。”《中国近代史》，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135页；傅启学（傅斯年）说，美国史学家认为“门户开放”是失败的看法是“偏狭”的。《中国外交史》，台北*三民书局，1960年版，第135页。】

柔克义厌恶列强“黑暗时代”式的做法，对中国的革新也感到悲观。【注释：在给贺壁理批评1900年列强以“黑暗时代”方式占领北京的回信里，柔克义说：“这事从头到尾使我又厌恶、又疲惫。”又说：“大概要过很久美国才会再卷入类似的混乱。”Whitney Griswold, *The Far*

Eastern Policy, p. 83. 1901年，他在给海约翰的信中说：“我深深地感到……（中国）整个的统治阶级无生气，无能，无爱国心。中国的前途看起来是很黑暗的。”Michael Hunt, *Frontier Defense and Open Door*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59.】

1905年柔克义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到中国就任时，他所面临的亟待应对的问题是 中国港口城市发生的抵制美货运动。这是发生在中国的第一个抵制外货运动，目的在于抗议美国排华法、华工在美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以及联邦法院及州政府对屡屡发生华工被排斥事件的漠视政策。【注释：美国排华风潮在1882年“排华法”通过后势头不减。1888年，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说：华人“份子不懂我们的宪法和法律，……置我们的治安及福利于危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本杰明*哈里逊 (Benjamin Harrison) 说：他的“职责是用排除那些外国种族的方法来保卫我们的文明--这些人与我国人民的同化既不可能，又非我们所欲。”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当清朝因英国购买中国的茶和工艺品而贸易出超时，乾隆皇帝对英王乔治三世要扩充贸易的要求也有类似的回信：“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J. L. Cranmer 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 lung, 1793-1794 (Hamden, Connecticut: Archon Books, 1963), p. 340. 关于美国的华人移民政策及中国抵制美货运动，参阅 C. F. Remer,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3), pp. 29-35.】柔克义上任之后，

立即与抵制运动的组织者上海商业同业工会接触，然后警告中国政府：中国将承担一切美国及美商因抵制及其他原因所遭受的损失。对美国政府，他报告说在抵制运动下他首次感到中国正在改变的潜流：公开发表的民意、土生土长的新闻业、萌芽的爱国精神。【注释：很多这些改变是由归国的中国留日学生发起和推动的。】

柔克义的“门户开放”政策和抵制美货对策的指南是，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则中国必须安定和有秩序。【注释：1900年，柔克义写信给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说：“门户开放”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贸易，更是在增强北京政府，使其无法逃避对条约国家的义务。” Whitney Griswold, *The Far Eastern Policy*, p. 76.】就是在这些演变的外交及政治环境下，1903到1907年（光绪二十九至三十三年）间的中国驻美公使梁诚(Sir Chentung Liang Cheng)促成了美国政府退还部分赔款。

1875年（光绪元年），11岁的梁诚是肄业局的第四批--最后一批中的学生。在进菲力普*安多弗学校(Phillips Andover Academy)之前，他先跟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

的教授补习希腊文。在安多弗，他是垒球校队的红打手及投手。1881年（光绪七年）的回召使他第二年去耶鲁或阿默斯特上大学的计划破灭。回国后，他在外务部做事（把垒球运动也带回来了）。起初在欧洲时，他的外交才干引人注目。【注释：1897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梁诚为爵士。1898年，在陪醇亲王因山东杀害德人事对德国道歉时，在是否应该向德皇(Wilhelm II)叩头表示歉意问题上，梁诚巧妙地解决了这一外交争执。Walter Muir Whitehill, *Portrait of a Chinese Diplomat, Sir Chentung Liang Cheng* (Boston: Boston

Athenaeum, 1974), p. 13. 1873年，英使也很技巧地拒绝给乾隆皇帝叩头，而以见英王屈单膝的同礼示意，但免吻手礼。梁诚在公使任期内以安多弗学校的忠真校友著称。他也被选为阿默斯特学院1885届荣誉毕业生，并获得耶鲁大学和阿默斯特学院授给的荣誉学位。】在华府，海约翰（海有中国之友的声誉）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罗持有重视日本人和那时盛行的藐视华人的态度）好像都很友善地接待了他。【注释：梁诚在公开讲演中批评美国政府及法院对美国国内排华事件的冷漠政策。在芝加哥的一次讲演中，他说：“在过去25年中，在美国被杀害的华人超过同期在中国被杀害的美国人。..... 中国对每一个被杀害的美国公民作出了赔偿，几乎所有作案人都被处以死刑。可是，我痛心地说，我不知道在美国是否曾有杀害华人的罪犯被处死刑，在那么多的案件里，只有两次，受害的华人得到了一些赔偿。” Arthur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p. 165.】

关于《辛丑条约》，梁诚力促美国庚子还款。他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发表演讲、与美国政府官员商讨等方式，力陈退款理由。他对海约翰说：“美国人民在《辛丑条约》条款中享有一些公理和权利。可是，外交无法对这公理和权利给出答案。”他建议：“也许对赔款额加以调整可以使总统较清楚地看出我国要求的公理。”【注释：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3,

1907. 这是一篇在美国国务卿宣称美国将退还庚款后，《纽约时报》对梁诚进行的采访，标题是“中国赔款是如何减低的：中国公使梁诚爵士透露有趣的最近外交史。他首次讲述如何为他的国家省了2700万元。”最初，中国要求美国暂时接受以银代金为赔款，但被拒（《辛丑条约》规定赔款以金交付）。梁诚遂改变策略为退还部份赔款。这篇报导显示出梁诚在不利的协商条件下，为争取美国政、民、舆论界对赔款的支持所采用的外交策略。我认为，如果梁诚没有在幼年时所学得的知识和对美国国情的了解，以及他多年前结交的朋友和同学的佐助，他的协商退款的工作会更困难。1907年，在安多弗学校的一次毕业典礼上，他告诉聚会的校友26年前打垒球所带来的交情：“当时我跟（罗斯福）总统说我就是那个人，那个在1881年用三垒打击败菲力普*埃克塞特学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 菲力普*安多弗的兄弟校)，而使安多弗获胜的人”，“从那时起，总统和我的关系增强和接近了十倍。”在《留学美国》里，钱宁谈到一些中国留美学生的“围城”心态，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冷漠态度--他们只是在美国过得比在中国舒服一些的华人。这与容闳及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留美学生那种与美国社会密切和积极的交往是不同的。在这篇访谈里，梁诚也谈到由于他在美国受教育而带来的信任问题（问题源于他觉得他无法使清廷了解美国政策的一些社会原因）：中国对他有多少信任？（钱宁在《留学美国》里也讨论到这问题。）

他说：“虽然中国人认为我是一个善良美国人，而我一直是一个善良的中国人。”又说：“当我的良知提醒我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善良的中国人时，我绝不能当一个能干的美国人。”这篇访问最后谈到梁诚对被召回所感到的意外，其结语说：“在5月他得知被召回时，庇护他个人心情的是他的爱国良知。这良知也是任何一个有风格的政治家在受窘时的慰藉。美国外交圈对这位出众的东方大使的评价有多笃实？多热切？这可以从上星期总统令国务院退还庚款的决定中看出。”访谈中，梁诚还谈到抵制美货、“门户开放”、义和团运动、华侨对排华法的反应、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化教育所寄予的期望。】他逐步拟定了一个可能的削减，海约翰同意向总统推荐这计划。但计划的实现因日俄战争爆发、罗斯福介入战争的调停工作，以及后来海约翰的去世而耽搁。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4月，在柔克义离美赴华就任公使职之前，梁诚致函外务部，说赔款减额方面大有进展，而且他已与柔克义见面，商讨减额步骤。在商讨时，柔克义称美国总统希望知道如果美国退还赔款，中国将如何使用这笔钱？梁诚回答说，中国不可预先对外宣布如何处理内政。梁诚意识到美国有意干涉，也担心中国会失去对这笔钱的掌控。他遂建议外务部在接见柔克义时事先准备好这问题的答案。他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想法：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他的判断是，美国政府及民间都会支持这个计划。而且，如果此计划得以实现，会对中国有益。【注释：《驻美公使梁诚致外务部函》，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十日（1905年5月13日）。】

1905年7月12日，柔克义到中国两个月后，正值抵制美货的高潮，柔克义上书罗斯福提议退款。他说，中国政府向他表示，美国若退还赔款，中国将把这笔钱花在教育上。罗斯福的回信长于公理和正义，短于具体行动。【注释：Whitney Griswold, *The Far Eastern Policy*, p. 124. 柔克义与罗斯福的通信，现存于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Houghton Library）的“柔克义文件”档案中。在研读他们的通信后，我并不觉得总统曾问过柔克义，说如果美国退还赔款，中国将如何使用退还款额，如梁诚跟外务部所呈报。可能柔克义是从海约翰处间接得知这个问题。】虽然抵制美货运动在1905年9月已经渐趋平息，柔克义在下半年并没有继续推动退款，原因可能是海约翰的继任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提出等到美国收回“足够的”赔款后再开始退还超额部分。【注释：1907年3月12日，梁诚致函外务部说：“美国减收赔款一事……，前月探闻外部如提复波斯顿友人书，有（谓？）赔款终可减少，惟现收之数，尚未足额，非俟数年以后，不能定议等语。”罗香林：《梁诚的出使美国：1903-1907》，

香港*香港大学亚州研究中心，1977年版，第150页。】

1907年初，梁诚经美国内政部长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及商务和劳工部长奥斯卡·斯特劳斯（Oscar Strauss）再向罗斯福进言退款。罗同意付于行动。【注释：罗香林：《梁诚的出使美国：1903-1907》，第151页。】1907年6月15日，美国正式通知梁诚美国的退款计划。【注释：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9, 1907.】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要求国会授权，退还及取消超过美国实际损失额部份，共1400万元，本息一共2700万元。1908年5月25日，国会削减了总统的要求额200万元，授权总统退还赔款。【注释：当众议院辩论退还赔款时，1887-1894年间曾在中国海关做事的密歇根州国会众议员埃德温·登比（Edwin Denby, 田贝之子）说：中国人在这件事上，“除了我们亮给他们看一看我们的文明既有战舰也有公理之外，是毫无地位的。可是在对一个外国势力显示公理和慷慨前，我们更应该对那些市场和创业受损的我们自己人显示公理，就连慷慨都可以。”Michael Hunt, "The American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A Reappraisal," p. 547. 登比和梁诚在1906年4月因《排华法》也起了冲突。登比在美国众议院讨论《排华法》时，指控中国政府官员买卖移民证明文件。梁诚致函美国众议院，说登比的话是虚构的。登比在国会发言反驳，也指责梁诚违反不公开评论在国会讨论的法案的外交惯例。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7, 1906. 庚款最后赔款额为1250万美元及利息。Westel W. Willoughby,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27), p. 1013.】可是两国在如何使用退款问题上的争执远在国会授权总统之前就开始了，直到1909年。梁诚虽然最初建议外务部对柔克义宣称中国要把钱花在教育上，他和继任伍廷芳（1907年秋初接任）及北京政府都反对美国政府的干预。北洋大臣袁世凯试图用这笔钱在东北修建铁路以抵制日本和俄国在那里的势力扩展，然后将经营铁路的盈利用于办教

育。柔克义一再挫败中国力图掌控退款的努力。【注释：柔克义在1905年写给罗斯福的信里表示出美国应该控制退还赔款的使用的想法。另外两个在1881年被召回国的中国留美学生也参加了退还赔款的协商：外务部主席梁敦彦和1908年11月被任命为鸣谢退还赔款的赴美特使唐绍仪。唐赴美的另一任务是向美国争取一笔以退款为保证金的贷款。唐到华府后，柔克义和国务院大为宣传庚款教育计划，使唐绍仪很难有机会讨论贷款。唐的任务失败了。Michael Hunt, *Frontier Defense and Open Door*, p.174.】他最后警告说，接受美国的条件，否则面临拿不到这笔钱的危险。在最后的协议中，教育计划被列为一个附件，同时也不提减低赔款的事。这样，两边都下了台：看起来，美国没逼中国；中国也没屈服。美国的舆论和一些个人都对退款大为赞扬。【注释：1907年6月20日，《纽约时报》用“全世界的一个榜样”为题的社论评论赔款的退还。其结语说：“再一次，而不是第一次，我们为各国做了一个榜样：把正义和公理的原则以及正直人们的高尚理想输进国际关系中。”美国驻华公使的妻子，同时也是北京使馆区围困的幸存者萨拉*康格（Sara Conger），在1907年9月22日给她侄女的信里说：“美国并非被迫取消赔款，这态度之深、宽、高不是文字可以表达的。这不是一个很随意而采取的态度。它的种子是随着‘五月花’来的，被种在自由的处女地里，扎下根，受到珍贵露水的滋润、爱的温柔的养育，以及真理坚韧的维护。”Sara Conger, *Letters from China* (Chicago: A. C. McClurg & Co., 1909), p.373.】中国因为退款乃能再度送学生去美国。这一次，经费有31年的保障。退款的一部分钱用来办清华学堂以培训留美的学生。1909年（宣统元年），第一批庚款学生到达美国。

美国和中国：不同想象中的远景

1871年和1909年的美国接待和中国派遣学生是各自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去追求想象中的远景的。美国接收中国学生的真诚是基于其基督教传教士的热诚和理想：中国要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因此中国人会变得爱国、勇敢、不自私、头脑清醒、诚恳--一些中国人所缺乏的基督徒所具有的个性，而中国学生必须接受西式教育。当蒲安臣作为中国巡回大使在美国替中国鼓吹时，宣称中国转变成基督教国家的时机已成熟了。很多支持容闳的人是哈特福德市避罪山公理会（Asylum Hill Congregational Church）的教友（年青的容闳是塞缪尔*布朗牧师（the Reverend Samuel Brown）在中国教书时的学生，后来也是布朗牧师带他去美国的）。

1890年（光绪十六年），也就是义和团运动十年前，美国在华传教士教育组织主任、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汉学家之一的阿瑟*史密斯（Arthur Smith），总结他对中国的观察时说：

“他们（中国人）所缺乏的是个性和良知。.....在盎格鲁-萨克逊人种里，培养个性和良知的力量是基督教，而且这力量随基督教的扩展而增强。.....中国需要正义。要具有正义，

中国绝对需要了解上帝，学一个新的人的观念，懂得人与上帝的关系。.....基督教文化可以永恒地、完整地、唯一地满足中国的多方面的需要。”【注释：Arthur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894, orig. pub., Shanghai, 1890),

pp.316-330的结论受到他在中国看见的抽鸦片、妇女缠足、女婴被弃、养妾，以及基督教所憎恶的多神、泛神、无神的一些社会现象的影响：“中国人最无生气的思想特征是他们随便地接受有身无魂、有魂无灵、有灵无命、有宇宙而无因由、有乾坤而无上帝。”*Ibid.*, p.313. 史密斯认为儒家是中国社会病态的根源，但他并未考虑到中国多世纪来每况愈下的贫困对中国人的影响。譬如说，他认为三个抬西人轿子的苦工，抬了25英里后，不愿花五分钱买一碗稀饭吃就回来的节省的生活习惯是“无理性的”。史密斯的另一本书是*Village Life i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 1899).】

1906年3月6日，史密斯谒见罗斯福总统，建议退还赔款（但是他认为赔款是美国应

得之财：中国对美国政府犯了大罪，赔款是加给中国的“惩罚”。）同年，伊利诺伊州大学校长埃德温·詹姆斯(Edwin James)上书罗斯福说：

“哪一个国家能成功地教育这一代的中国青年，那个国家就可以在一定的支出下得到道德、知识，以及商业上的最大回收。……通过道德影响所得到的回报超过任何其他方法所得到的回报。贸易随着道德和精神足迹前进的可能性超越随着国旗的足迹前进的可能性。”

【注释：Arthur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pp. 213-216. 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学者有关庚款退还的研究，因为不知道有“柔克义文件”（该文件首先给格瑞斯握得用的）和梁诚与外务部的通信，把成功地游说罗斯福的工作归功于史密斯。美国退还赔款的宗教潜流在萨拉·康格尔的信中也可以看出。】

在中国方面，派遣学生的目的是学机械知识，由此可用坚船、利炮去抗拒从海上来的“洋”人对中国领土和财富的掠夺。两千年前，为了阻止从陆路入侵的夷人而开始修建的长城也是出自同样的想法。19世纪70年代的肄业局局长吴嘉善和陈兰彬--两位儒学熏陶出来的翰林院士，也反对肄业局，认为留学生所受的美国教育已逐渐地在侵蚀这些学生所必须保留的中国文化理想。湖广总督张之洞很透彻地刻划了中国人对哪些西学可接受，哪些不可接受的心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他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上书皇帝倡导留学日本时说：“欧美无学不兼讲西教，日本无学不兼讲伦理。”【注释：《光绪政要》，第27卷（1901），第20页。】

美国还认为1881年的留学生回召使他们错过了影响中国的良机，因此要再来一次。詹姆斯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说：“如果美国35年前引导中国学生来美国求学的事成功了--有一阵看起来是很有希望的，而且继续地吸收大量的中国学生，美国今天便可以最巧妙地、最令人满意地控制中国的开发--支配它的知识和精神领袖。”【注释：Arthur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pp. 214-215.】

美国要中国学生学它的道德、精神，以及思想；中国要他们学美国的机械知识。用教育来了解贫穷的根源，找出解脱贫穷桎梏的方法，中美双方都没有提。

民国时期的留美学生

到1911年，也就是清朝的最后一年，庚款一共选派了三批留美学生，计119人。【注释：由于清政府在1911年被推翻，11个在1901年通过考试的预备学生在1914年才成行。胡光廬：《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中华民国成立后，庚款的学生是从清华学堂选出来的。从1912年到1925年，共852名学生被派遣，其中包括43名女生。【注释：女学生必需有“天足”。后来，当经费不够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女留学生的派送总是首遭停顿或延缓。中国女学生留学美国及日本始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见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1847-1975》，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73、167、273-274页。】1928年，清华学堂改成全科大学，庚款也开放给全国的学生。虽然后来因为其他资助留美渠道的增多而减低了庚款学生在留美学生的比例，庚款还是招收了许多优秀的学生。【注释：庚款学生钱学森，在20世纪40年代末成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一位杰出的火箭专家。在麦卡锡时代，钱学森被美国联邦政府指控为共产党员，先遭被捕，后被驱逐出境。参阅Iris Chang, *Thread of a Silkwor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1936年，也就是抗日战争开始的前一年，公私费留美学生达1002名。1938到1945年抗战期间，留美学生人数急降到每年还不足一百名。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立国后，中国大陆有30年没有送学生去美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准许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回大陆。钱宁在书中也叙述了这段往事。

留学生在华国的影响

美国教育给中国到底带来些什么？许多在1881年被召回的学生，虽然突然被迫辍学，但后来在工程、工业、金融、军事、文职等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注释：Thomas E. 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 142.】由庚款培植的20世纪的学生，如《留学美国》一书的作者指出，也是一样的。从美国回国的留学生，其中的一大批为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20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回国后参加了推翻满清的革命，而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留法学生回

国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

造成这种不同结果的原因很多，例如学生归国时的年龄、在外国修读的学科。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在国外求学期间教育经验的稳定性。去美国、英国、德国（和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的学生受到了系统的教育，没遭遇到分心的事情。可是去法国和日本的学生常常因为经费无着、中外关系的冲突而要考虑求学以外的事情。在多年安定的教育环境中求知，学生便很自然地成长为建设者。

教育是中国儒家的千年传统，留学美国是一个近代的发展。但美国教育的质量和开明已经给留学美国这个渴望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扎下了一个敬佩和信任的根。这敬佩和信任，始于1847年去美国读书的容闳，条约无能勒令维护，法案和战争无能摧毁，到今天还是完整的。

朱祖凯：台湾大学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一直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等离子物理实验室（Plasma Physics Labora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1994年退休后，从事对其以往的实验结果进行理论物理的解释工作。